

G717

内部材料  
供批判用

批判語錄合部

# 刘少奇的八篇毒草

(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黑讲话、黑指示和“检查”)

—1966·6·21至1967·8·1—

## 目 录

- 一、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的黑指示 (1966·6·21至7·14)
- 二、刘少奇在北京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的讲话 (1966·7·29)
- 三、刘少奇八月三日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讲话 (1966·8·3)
- 四、刘少奇八月三日对“八一战斗团”代表讲话 (1966·8·3)
- 五、刘少奇八月四日在怀仁堂接见对工作组领导骨干讲话  
(记录) (1966·8·4)
- 六、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1966·10·23)
- 七、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认罪书” (1967·7·9)
- 八、刘少奇的“检查” (1967·8·1)

广西联指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南宁試驗站毛澤东思想战斗兵团編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

## 编者的话

为了配合批判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汇编刘少奇的八篇毒草，即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黑讲话、黑指示和‘检查’，供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时参考之用。

从中可看出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面目：

- 一、扑灭革命烈火，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革命小将定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从而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目的。
- 二、反对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抬高自己，在很多场合不提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和巨大作用，胡说什么“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各高等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以保护少数之名，来反对毛主席和保护牛鬼蛇神，如胡说什么：“清华大学有一个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让他贴大字报吆！”
- 三、模糊党的阶级路线，同情和庇护牛鬼蛇神及其家属，胡说什么解放全人类“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
- 四、三次假“检查”真反扑，把自己打成“老革命”，把罪状推到别人身上。
- 五、……

同志们，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把这八篇毒草批深批透，肃清他的流毒！

一九六七·九

广西联指广西热作所南宁试验站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

# 炮打司令部

## —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全国第一張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評論員的評論，写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这張大字报和这个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資产阶级立場上，实行資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見，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資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錯誤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嗎？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进行镇压群众，这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是会把无产阶级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德国首先发动，而由法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没有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美国来完成。但也沒有实现。现实的历史可否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看看现在修正主义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象人们所说，国际希望在中国吗？

看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因而变成更宏偉的力量。我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 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的黑指示（1966·6·21至7·14）

六月一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通知广播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六月八日工作组进入师大一附中，变成了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试验田”，刘少奇曾经两次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前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师大一附中工作组中有五名该校学生，其中包括王光美亲生爱女刘平平，工作组撤走后，刘平平又是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并下达了十多次黑指示。

六月二十日，师大一附中高三（二）班学生何方方、陈永康等贴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革命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指出工作组在师大一附中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说“不论什么人，不管他后台多大，资格多老，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把他揪出来……”这是一张写得非常好的革命大字报，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对刘平平等作了如下黑指示：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帮不肯定，辩论一下就不要多辩论了。要团结大多数吆！只要大多数贊成就可以了，讓他們保留意见，以后来吆！不要说人家假检讨，但要说不够。投机也不怕，投你们的机，也投革命的机。人家投到你那儿，你为什么不要，但要警惕。……刘超（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斗倒了，党支部不行了，同学不信任老师，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的表现。……争取多数，全部老师‘起义’，假的也好。”

六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又发下黑指示说：“要争取陶书寅（原党支部，原校二号当权派）起义，如不起义，就斗争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发刘超、前市委，不要怕她捣乱，越多越好，可以揭吆。……孤立刘超，背靠背地揭，让她揭，不揭再斗，也来得及，老师揭的掌握在工作组手里，可让陶说，你们听了听。如果先斗，她就知道底了。一方面收集材料准备斗她，另一方面争取她起义，也可以谅解，也有理了。如果揭得好！可以开检讨会，从宽处理，也不要马上定下来，可以放放风，争取别人起义，这样也做到仁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吆，弄假成真。他要对他们说很不够，要进一步交待。否则的话，不策略，战术不好。争取就是瓦解，国民党军队可以参加解放军，一样打仗，就换一顶帽子，沒有很多起义，就不够揭到底。”

何方方、陈永康等革命大字报贴出不久，马上有不少大字报表示支持，高三各班有卅多人支持何方方，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六月二十四日又发下黑指示。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条地驳，他出五十张，我出五百张，但是在搞地下活动，違反工作组指导，利用群众情况（不明）乱斗一气，把文化大革命搞乱。高中辩论完了，初中也要辩论，要不还会被利用，揭露何方方反动面目，你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边一定有刘超、前市委或高级干部，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大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高三（四）的几个人利用了“乱”，乱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方方他们。

要开大会，照原来的，要相信群众，不一定打人吆！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师大附中连续召开“辩论会”，实际上是斗争会，对左派学生进行批判斗争，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石洪，亲临现场，宣布何方方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何方方等被迫检讨，何等检讨后，刘少奇又下达黑指示。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吆！让大家知道吆！（后台）能问出来就好，问不出来，就算了，讓他們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好的，不可能……。”

“现在形势好……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没事，要提高警惕，何方方的

检讨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下次可以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更精明了。”

根据刘少奇的要争取老师全部“起义”的黑指示，师大一附中大搞群众斗争，老师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最后工作组还宣布，有百分之多少老师检查通过了，有多少没通过，……七月十四日刘少奇说：

“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开）工作队，革委会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同学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

刘少奇“指示”要追何方方后台，最后刘少奇居然荒唐地把高二学生中马德龙当做何方方的后台，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听取师大一附中革委会汇报时说：

“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马德龙汇报了总后勤宣传部柳副部长和牛德龙情况，说正在追查中，牛德龙是学生还是老师？（答：学生）跟何方方、陈永康是一起的，没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吗？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都是干什么的？陈永康、何方方承不承认他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吗？你们没有斗他们这些人？没有打他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马德元汇报中已很久不到学校，绝食）绝食，让他母亲劝告一下，学校里没办法，他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误……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吆，他们是高二的（说已经高三了）快毕业了，毕业了还留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给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他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是要捣乱，没人管，就这几个办法，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多数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可以了。孤立起来，可以不做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吗？可以教育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受骗。”

## 刘少奇在北京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 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我也是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革命师生，革命学生、革命员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们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靠你们，要靠各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践中学会革命。

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也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但是比你们，知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知道要革命，后来总算知道了一点。不知道怎样革命，但是后来怎样呢？也革了。在革命中经过各种挫折，犯了错误，改正了，再犯错误，再改正。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各种情况都遇到过，我们遇到的，你们也会遇到，因为以后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

怎么革命，现在只能一个方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革命教师、革命学生、革命员工，团结广大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来进行革命，放手发动他们来进行革命。只能讲这个方法，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经过一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

你们以前又吃饭又上课，中央决定这半年只吃饭，不上课，你们现在有饭吃，吃得饱，又不上课，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你们在半年中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向你们学习。我相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运动中遇到具体问题就向毛主席著作求教，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更多地学习，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讲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向。斗争的主要矛头，一个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

东思想的当权派，这是一小撮，不是好多的。其余有些犯过错误的可以改正的。对这种人要斗到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方针方法。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完全靠各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

过去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的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撤退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就走，不让他们走就不走。如果你们有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评够了，没有意见了，他们也向你们检讨了，你们认为他们可以走了，他们就走。有些人要抽出来，你们要他回去就回去。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在你们学校里做工作，好事是和你们一道做的，错了是和你们一道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好事、错事你们清楚、错误、缺点你们清楚。在运动中，他们的错误、缺点，由你们做结论。至于他们的人，还要根据他们的历史情况，你们也不清楚，你们不能做结论，应由他们的机关做结论。现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要求听你们的意见，听你们的批评。

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你们自己选，当然经过大家讨论，大家酝酿，酝酿成熟被可以选。你们当主人以后，学校里的文化革命由你们做主来进行。党中央和党中央的同志们如果能帮助你们，尽量帮助你们，支援你们。但是，我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你们的意见，不能提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不了解情况呀！首先向你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看有什么问题，各种意见都听了，如果有经验，我们可以提提。

你们的责任更大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文化革命搞好，如果北京文化革命搞好了，对全国有意义，对将来有重大意义，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重大意义。我愿意到你们哪一<sup>个</sup>哪几个学校去向你们学习，希望你们给我自由，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这一点，我也有这个要求，我愿意去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我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因为我不懂。

今天可以向你们提出一点建议，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这也是根据最近的经验，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也就是意见不同的少数人。今后有各种意见要讨论，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牛鬼蛇神要出来，同志中也要辩论，辩论和斗争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辩论会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经过运动，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是少数。在这个问题上是少数，在另外的问题上可能是多数。不止是错误意见是少数，正确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呀！有的意见提得并不错，但是少数。毛主席在很长时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是少数。

但怎么保护少数呢？第一个对于讲错了话，做错了事的人，应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不要轮流辩论，不让他吃饭睡觉。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可以保留，也不要强迫他们接受别人的观点，承认错误，改变观点，写检讨书，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辩论，他不愿意讲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讲，不愿意参加辩论可以让他走，他是少数，人家扣帽子，他害怕，他就要溜走。青年人，我们是知道的，一辩论就举起拳头来，站在桌子上，辩论可以大会辩论，小会辩论，会内辩论，会外辩论，大会讨论，小会讨论，不同意见是经常有的，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不要轮流跟他辩论，不要不让他吃饭睡觉，要让他休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不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坏人贴反动大字报，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说反动话，但也保护。他只写了几张大字报，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说了几句反动话呀！定反革命，定右派还根据不足，等等再作结论，让他多讲一些，多写几条反动标语，不妨碍大局。可能保护少数坏人，保护几个月，可以积累材料，不会冤枉好人，让他活动，让他自由活动，对发现反革命线索有好处。怕保护坏人，你们的意见是这个吗？保护了坏人，保护了几个月，我看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垮台，主要是不冤枉好人。清华大学有一个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那么多人揍他，公安机关、工作队怕把他揍坏了，就把他拘留起来，我在清华看了二个钟头的大字报。让他贴大字报呀！在运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总的说来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暴露出来好呀！只要不杀人放火，在食物中放毒，在饮水中下毒，威胁群众，这种人要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一个时候，几个月当然不是一刀斩齐，再作定案，定了案以后，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他乱说乱动。材料还不够，还不能定案。如何定案，由你们讨论，当然要有一定的手续，一定要在运动后期作结论。一般对黑帮、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假革命、假左派，等到后期作结论。在未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我就提这么一点建议，这建议是否对，你们是否同意，由你们讨论，你们决定，由你们考虑。

（口号从略）

# 刘少奇八月三日 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讲话

(1966.8.3)

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否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要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会亦可以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吆，你们自己罢，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以临时找个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让他（她）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信心。选不出来，临时找个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群众不满意一、二个委员，党会丧失威信，处理党员在最后吆！谁最后入党，看最后决定，是不是省得他们罢你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保什么皇呢？保个党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校党委你们不信任他，你们就罢吆！统统罢掉，统统罢了，好人呢？罢了再选吆！信得过再选出来，信一个出来一个。你们不罢他，群众有意见，党就处于被动，你们这么一做就好了。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

（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他们都来，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就不会有意见了。

我到你们学院，你们只知道来个负责同志，你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来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认识我吗？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不要发生误会，这里没有问题，没有阴谋。

你们要求二个合并，你们首先提出来，好吆！我们赞同。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肯定她是右派，你们就团结吗？她也是你们的团结对象。（李雪峯：她贴大字报也可以，新市委的可以贴，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说不成黑的。）她们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反驳，也可以象你们说的不反驳。让她说够了，她就不说了，范兴慧是你们的团结对象，你们不让她写，禁止不了。他贴，我不贴，你们可以让她吆！你们党员要比他们高点。

工作组的问题，你讲讲，（指李雪峯。雪峯：两方面的人都来了再讲吧，他们那边人不在。）你们不满意×××的讲话，他的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你们提出罢官，这要求有点大，他们的错误就这么大。范兴慧是不是左派，以后还得看，市委同志讲范兴慧是左派，可能不对了，运动中，运动后，左派是有变化的，开始的左派，中间有可能就不是了；中间的左派，后期有可能就不是了。这个运动中是左派，另一个运动中就可能不是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到大风大浪中锻炼，不够左派怎么办呢？努力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点上不是左派，另一点上可能是左派，市委同志讲了这话，你们不同意，这再争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他就不再来了，干脆换一个吧，是吧？（雪峯：他已经不来了。）讲错一句话，可以吆！改吆！我来了，没有准备，又没有讲话稿，讲错一、二句，你们批评。

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我们可以团结吆！即使范兴慧真是右派，你们亦可以团结！五七年有些大右派，现在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搞专政。五七年右派，他们想改了，就摘掉帽子吆！是不是？摘了，他又来了，我们就再出吆！抓起来容易，扣起来容易。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做结论，作结果。有的就抓起来。大部分还是不逮捕，反革命分子定了，你们监督改造他，一般右派不抓，让他吃饭做事，他还要讲话，让他讲吆！他讲话亦没人听，有人听也不要紧，怕什么？所以抓起来容易，扣帽子容易，改造他难。党的基本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除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有些犯了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让他改过吆！你说不准吗？有的改得不好，有的改得很少，再看看吆！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

吆！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的子女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人容易，可是他们死了还有子女，子女不高兴。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有资本家的、也有干部不好的，他们的子女不要歧视他们。对之反动言论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歧视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不团结他们，他们就请示建筑部、市委、中央。

资产阶级“权威”允许你们批，加上比较坏的教员，斗、批、改全靠你们。你们可能犯些错误。青年人不犯错误怎么能行呢？让你们有错误就改，就行吆！有人问我有什么经验，错了就改就是经验。你们会想出办法的，需要党中央、市委帮助一下，帮助不了，你们自己搞。当然了，斗争当权派也好，教改也好，都要有准备，也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斗争中有准备吆！一边斗，一边准备，准备好了再斗，斗一次不行再斗一次，慢慢地就好了。教改，你们看的书那么多，你们把书分下去，大家看，大家批，教育革命也是这样。边改边学习，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什么事亦不一定都准备好了再打，斗争中学斗争。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讲这么几点。我是不是讲错了，可以批评。不要是我讲的就不能批评，允许人讲错话，特别是你们青年同学，不仅是你们青年同学，我们亦不能。有的话改来改去改了几十年，还有问题，基本上对，大方向对就行了，好吗？

## 刘少奇八月三日 对“八一战斗团”代表讲话（纪要） 于建工学院（1966.8.3）

辩论会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我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很多，要抓根，谁冒点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就好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点就回去了。

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两点意见：

（一）学校成分：不好的不少，对这些人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二）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可以改正错误，要给出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没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还种地或劳动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是有变化的，对不枪毙的人还算人，你要枪毙他，他就反，你就改造他，他要不改造，就永远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被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镇压坏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人。

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也不进不反、反的是一小撮，你们要团结，不管人家怎样跟踪你们，你骂我，我不骂你，你造谣我有认识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人“八一团”也不加入，“革命团”也不加入，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昨天不开大会不行，不开大会就闹起来了，今天说不完，明天还可以谈，摆事实，讲道理。讲几点意见：有党员，有团员、党小组长、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成立临时的，你们可罢官，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

院党委要负责，开全院党员大会，要改选，能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漫坐，把旧的院党委、院团委罢了，选出临时的院党委、院团委，选不出来也不急，等一时再由你们选，院党委能改选就改选解散。

以后支部开会不是秘密，还有非党员。党员开会不开秘密会，吸收非党员参加，由院文革决定，一半一半；比如两个党员吸收两个非党员参加，他们议论怎么办？要采取多数，不要把党员搞成黑帮，搞成反党。他们多数是好的。秘密会（指党员秘密会）由市委决定。

“八一”62战斗组 宋大墓 整理转抄 潘洁初

## 刘少奇八月四日在怀仁堂

### 接见对工作组领导骨干讲话（纪录）

1966.8.4

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向，是站在前面领导，鼓舞群众前进，还是指手划脚？院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对面反对群众运动，抵制运动，势必被运动冲垮。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束手束脚。

现在青年人超过我们。

工作组又被冲垮了。有点做官当老爷，“一定要照我的办！”工作组看来不派好一些。工作组阻碍运动，许多事情工作组都不会做。一般地讲反对群众运动，不让他们闹事，让他们干什么？工作队是带着框框办事。

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怕反革命出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了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

“造反有理”，历来统治者就怕造反。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不能造反。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也要造反。如果不让人家反，非把你反掉不行。还是引火烧身，让群众的火焰烧到自己身上来。不许群众运动造我们的反，都有这个问题。你立场方向是资产阶级的，阻碍以至镇压，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改组支部，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不开秘密会，恢复活动。可以造新市委的反，当然可以造你工作组的反，让他统治一个时期。通通罢官好不好？破坏原来旧秩序。

六月十五日事件可以提交群众讨论，是文斗，武斗？进行辩论。社会主义没有过（主要指我们）学生运动镇压不了的，怕大民主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大的群众运动，党内民主就搞不好。

实事求是（检查），可以大会、小会。两面（做工作）：工作队员和受工作队影响的群众。府首甘为孺子牛，说服工作队员。

（当时只记了几个要点，另外插话都没记）

记录者：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长，建材部政治部副主任

##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的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前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新市委工作组，地方的领导同志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的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情况，经常是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汇报中做了错误的决定，批准。我作了错误的

决定，如派工作组，都要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要人，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都很积极，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绍派往各学校，此外还向各机关派工作组，一开始就做出了限制群众的方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大字报上街，要内外有别等……批发了北大工作组的错误做法，认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这就给全国定了基调，还批准了一些给中央的报告，也发生了不好的影响。在北京许多学校，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因此在许多学院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了革命，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我过问的王光美参加过的清华大学的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过问的北师大附中也进行了排除干扰的斗争。解放北京市党团员只要在认识检查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不错的，但过早同意，北京过早恢复党团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走后就把权力交给筹委会，文革，这些是工作组指定的，他们受影响较深，北京市中学也程度不同的犯了以上错误，此外还同意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计划，使中学一二年级学生放假参加劳动和军训，以些教师集体集训，现在看来是不应该派工作组的。

当时许多方面要求派工作组，特别是报纸报道了北大派工作组，以后要求更强烈了，这时没有就派工作组进行讨论，也没有就派工作组进入学校机关后怎么办，应当说我们对文化革命是很不了解的。但是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只要参加到运动中去，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然后才能对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这场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新阶段，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我们只能在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派也只能派些联络员去了解情况，对于群众运动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当时有些同志发现并提出工作组和群众发生对抗，并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伯达同志，当时就提出过，伯达是领会主席思想的，当时如果我们能够去领会主席思想就撤走也不会发展到路线、方向的错误。

当时有些地方对工作组的领导和某些成员发生怀疑，也怀疑某些党领导人，由于工作组包办代替，并规定了许多限制，这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即使当时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的言论，当时也有极少论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正常现象，应拿出相当时间让不同言论充分发表出来，恰在这关键时刻，由我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以上错误决定，在工作组的五六十天中，由于我的错误，这样就加强了和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有些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撤走后又派去新的工作组，在工作组许多同志很不了解，又不向群众学习，而要群众按他们的规定去走，这就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事实上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裹挟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很不明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利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的和路线性的错误。如：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就政协会议开过后，我向中央写过指示说政协将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新阶段，这是对时局估计错误，有和平幻想，虽然也谈到练兵，减租，生产（？）是不错的。

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有错误，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指导是不够，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就没有系统的全面的解决，当时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及时纠正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中农问题。

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不少话纠正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分性急的做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当时有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没有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矛盾。

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缩掉二十万合作社的决定是我支持的中央会议说的，没有反驳，事实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缩掉二十万合作社。

六二年我犯右倾错误，六四年又犯“形左实右”，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跟以前错误是有联系的。

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七千）用我的名义做了书面报告，以后又做了发言，在书面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五八年实行三面红旗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

更严重的是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由我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六二年中央财政预算，发现了二十亿的财

政赤字，因此对困难的估计错误，认为是处在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向国务院的讲话是根据在中央会议上讲话加以发挥的，中央还批发了这个报告，还要省一级的党员干部讨论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在会上各地鼓动歪风出笼，单干风，有的人就根本否认真三面红旗，就把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并把不该下马的大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有些应该灭绝的投资没有灭绝，由于当时我过分相信陈云，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我向中央和主席推荐陈云做中央财政小组组长，此时主席不在北京，就到主席那儿去请示报告，我后来才知道主席根本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和做法的，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们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就提出分田到户，还有一位就提出“三合一少”的意见，这都是对国内外形势估计错误的情况下提出反对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当时我已经感到很紧张，形势严重，因此急于请求主席回北京。六二年到六二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犯了右倾路线错误从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进一步发展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和商业的决定，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矛盾。九月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两个决定和公报，才把我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形势根本扭转过来。

我六二年犯了错误之后，六四年又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六四年四月一日于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后，九月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又制定了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后十条怎么制定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前十条出来后走了六个月会向主席写了报告，后十条就是这个报告的精神，六四年九月后，我发现后十条有些不利于发动群众，六四年夏我到各省和北京讲过话，强调各级领导到农村蹲点，这本来是对的，但强调过分，有些绝对化是错误的，此外还说过，在这以后的四清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些是失败的，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估计过分，对干部犯四不清也估计过分，因此当时对工农业生产好起来的原因（因？）某些理解也是错误的，还说过在发动群众斗争中才能摸清情况，认为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是不够的，有时说不适用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主席思想，这是极其错误的，影响很坏，当时又过分相信光美的经验总结，向全国，北京推广经验，这就给许多同志极不好的印象。其实光美经验在当时就有错误的，在六四年的中央会议上，我的错误没有认识，又说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所说的，这没有说明本质，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忘记了我们党十几年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因此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我的错误也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运动缩小到极少数人的身上，由于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特别是在六四年、六二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在这次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又是从我们的党和人民的四大，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亲自纠正的。

七月二十四日的决定撤走工作组后召集了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十六条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选举，会议一致把林彪同志做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主席接班人。决定和公报以及对组织整编是必要的，对全国全党有深远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有深远影响。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我决心遵守一个党员应守的纪律，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 犯错误的原因：

1. 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以后如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就必须真正走群众路线，广泛的深入的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迷信工作组的作用，去包办代替群众运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

2. 错误估计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出现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完全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脚，有时就站到资产阶级立场，在工作中又表现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4. 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的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群众中去学习，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实际上有时违背了主席的思想，对同志中的正确意见不听，反而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犯错误的理解，当然还是很不够的，我决心学习主席思想，向林彪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决心做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并消除影响。

(口号从略)

附：

## 戚本禹同志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向刘少奇提出的八个问题

1.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扬“坚决反共”？
2.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3.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化？
4.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5.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6.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7.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8.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刘少奇猖狂反扑的宣言书

——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认罪书”

(1967·7·9)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峯、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思。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峯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峯同志的讲话，以后吴星峯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沒有答复。有的交给了李雪峯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沒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了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沒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沒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沒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沒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有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在进行活动，既沒有经过改造，也沒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负担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讲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于沒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沒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沒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在解釋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还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

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 刘贼最系统最恶毒最猖狂的反扑

——刘少奇的“检查”（1967.8.1.）

按语：我们怀着满腔仇恨怒火，公布刘贼的又一个所谓“检查”。

这个“检查”比七月九日交出的那份“检查”更猖狂！更凶煞！更赤裸裸地暴露了他那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狰狞相。

这个“检查”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代表他的狐疑狗党，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公开挑战，是一次最系统、最恶毒、最猖狂的反扑。

在这个“检查”中，刘少奇集中了几十年来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捏造事实，篡改历史，攻击诽谤，打起“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破旗栽赃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他竭力推翻他是老反革命的定论，全盘否定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对他的严正宣判，妄想卷土重来，恢复他已失去的天堂。

革命的同志们，敌人拿起刀，我们也要拿起刀，这个刀就是革命的大批判，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这个落水的疯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遗臭万年！

誓将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

## 刘少奇回答戚本禹同志八个为什么

——刘少奇又一次“检查”

南海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志们：

你们1967年×月×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于×月×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

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写信二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塞进去的私货，以下凡打“△”的都是王光美亲笔写的）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

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殷鉴同志出狱后还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见过一面。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签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责任。

（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当时写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了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更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了我国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决议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就表示反对。但是来不及修改了，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場

上退了一步。  
△△△△△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的，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人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去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一九六四年，我在几个城市做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廿三日检查中已做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说清楚的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的错误以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示，我要读的其他指示和报刊文章，以便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我真正在革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华（签字）

红代会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翻印

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旗兵团转抄

67.8.1